之所以要写这一篇澄清理论的随笔，是因为一个叫“立雪”的人似乎给人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他当然完全不是某个严肃的值得反驳的理论工作者，但是他的专业基础、骄傲而确信的言辞以及我们管理轻率的授权，仍然使得他的话在当天听起来有一些欺骗性。

我们事实上的困惑已经结束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对他的定性了，他只是个幼稚的骗子而已，他提到的理论不值得采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天确实有许多人受他的言辞影响而对一开始的信念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一开始的信念不够清晰和明确。

为此我需要让那天所涉及的两个论题清晰和明确下来。如果下一次我们遇上一个伪装得更机灵的骗子，才不至于轻易上当。

立雪涉及的两个问题是：

(a)为了发展生产力，工农利益和正义的生产关系可以牺牲？

(b)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其政治领导，而非以实行公有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立雪受到大家的反对，是由于他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念太鲜明了，照他看来在生产关系上倒退、牺牲人民从而换取发展的做法是完全正当的，而社会主义从理念上就不用解放人民，而只需要发动人民以发展生产力。然而，如果他没有采用这种赞扬的态度，而是将这一切视作不可避免的牺牲，那么他的辩护就能在我们当中扎下根来了。不知不觉地，他会弱化一些听众的立场。

不能寄希望于他的愚蠢，而必须指望**我们自己在理念上的清晰**。

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取向在于哪一方面？这个问题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和巴黎手稿的结构中分别得到证实。

《共产党宣言》强调了生产力在历史中的决定意义，但是许多人只看到这部分内容。需要注意，与生产力同列的是人的因素：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武器与持武器者，二者合力推翻资本主义。这里的引用的第一句话谈的是生产力，“生产力对准资产阶级本身”，这当然首先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和资本主义必然的危机。而后一句谈的则是那在当前生产力中创造新生产关系的主体，即无产者。之所以无产者是这种主体，是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非人化。

“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它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

从历史哲学上，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增长与工人普遍的非人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从这个过程出发，历史提出一个直接的、**目的性**的要求，即**工人**从机器的支配中解放，重建属于人类的人类社会；也提出一个间接的、**合规律**的要求，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最终要受到资本主义的压制，**生产力**进一步的增长必须克服这种旧的生产关系。两个要求事实上是同一的，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路径和同一个目的，即共产主义。它们仍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两个要求的主体是不同的，人民提出了他们解放的要求，生产力也提出了它增长的目的，它们在道路中交织，我们找不到一条能真正实现一个要求而又忽视另一个要求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以二者并重为本的，而人与生产力当中，又以人为首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结构是很明晰的，它的整体结构始终在说明，青年马克思是以人的解放为本质目的引向共产主义的，而生产力在这里起的是工具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如宣言所述，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使用的“武器”。

有必要澄清的是，决不能把这个武器的比喻幼稚地理解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发展生产力，这种理解是范畴错乱的。生产力的构成本身就包含着人和生产工具的因素，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而当我们把这个生产力看作一个单独的整体时，这时与它对立的是生产关系。人在历史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作为物质性的生产者出现的，一次则是作为政治的、决定着的主体，后者即是生产关系的创造者。这种创造不能脱离开生产力而凭空完成，生产力由此被称为武器，而敌人是谁？无疑，旧的生产关系。

巴黎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言辞是哲学性的，但是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并不使得他的思想内涵也变成黑格尔主义的，事实表明他在这里的思想，有相当大部分的确是成熟的。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马克思在手稿中说明，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受的压制要在共产主义中得到解放，在生产关系中得到解放，这正是青年马克思推出共产主义的首要理路。十余年后，他用更成熟的语言形式重申了他的逻辑。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从1856年回望1844年，马克思从未放弃这一点：现实的对人类的异化是我们当前生产关系的首要弊病，新生产关系的根本点在于，它必须是属于工人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之所以是将死的，不仅因为它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顽疾，而更是因为它与我们不相适应，它使得生产力与人不相适应。

生产力在社会中的力量是自然规律决定的，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武器。然而拿起武器的目的是我们的目的，而不是武器的目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武器，我们人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武器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必然有一部分生活属于武器，然而武器的一切都应当是属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拿起这种武器，要用武器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把武器当做自己的目的。

“理论上完美无瑕！”如果你们这样夸奖我，我会感到失望，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在这里是如此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总体的教条摆在这里，让我们记诵，然而一旦遇见具体问题，这种总体教条就不能结合到现实中了。现实的因素多么复杂，根本不可能在生产关系上寸步不让！把消灭一切私有制当做第一条现实纲领，这只意味着寸步难行。马克思的教条是原则上的，是关于根本方向的；那么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现实与教条是分离的吗，我们要如何评述现实的偏离呢？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牺牲人民换取生产力的进步，为什么到了现实境况中马克思就认同了这说法？在下这个结论之前请注意以下两点：

1.这是一种对既往历史的科学评述，它是不带滤镜地从历史进程上观察的。对于既往的和全部旧制度的历史，我们无法在其中看到真正的正义，劳动者不可能从中得到真正的解放，这种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者自己的主场和自己的行动中才能实现。对于其他的历史主体，我们完全不可能指望他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必须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客观的作用出发。对于英国对印度人民的剥削，马克思在道义上不认同的同时又从科学上认证了它的历史作用，这是因为英国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握有现实力量的历史主体，而不是一个道义上的主体；而我们自己的行动，则不仅要合乎科学，也要合乎我们的道义，因为我们的道义事实上就是是否符合我们的目的。

2.印度人民的牺牲是为了生产力的进步吗？乍看之下是这样，但只要一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清楚明白地看到这种牺牲的特殊性了。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给印度带来任何生产力的增长，英国是靠着商品输出和税收的直接掠夺获利的，服务于印度社会的公共部门完全瓦解了，印度社会本身也陷于瓦解。不列颠在印度的最大贡献不是让印度获得了发展，而是打碎了印度原来的社会，让它准备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开始新的历史，而这个历史的目的地不言而喻。人民的牺牲在什么情况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在原来的社会走到死路，无法走上资本主义与否定资本主义的道路时才是如此。而如果已经站在工业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起点，那么没有任何死亡应该属于人民，死亡只属于人民的枷锁；除了进攻过程中的牺牲以外，我们不要牺牲任何人民利益。

列宁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新经济政策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却完全不意味着现实修正了原则。对于列宁而言，进攻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即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攻是一开始的策略，强制过渡到公有制在事实上没能成功，因而他才要采取更艰苦的围攻策略。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实和原则的割裂呢？我们是否能在心中铭记进攻的目标，但永远在围城营帐里生活呢，就像第二国际朋友们所做的那样？

“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

“我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现在，即１９２１年秋季和冬季，我们又一次退却，那么究竟要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到时候停止让步呢？你们这样做不是使处境更加危险了吗？当然，我们是增加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性，但是不应当忘记一切战争的基本规律。战争的要素是危险。在战争中你无时无刻不被危险包围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

很难找到这样清醒的头脑。记住这是一场战役！没人能在围城营帐里永远生活下去，必须用武器轰开城门，守军也随时准备渗透和突袭我们的营帐！无论是围城还是强攻，始终只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即入城，这城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长期缓慢的过渡是一种策略，但是第一，不能不尽可能向这个方向过渡；第二，不能将目标与手段混淆，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手段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在可靠的指挥官这里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许在特定的策略中我们可以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是暂时性的和清醒的，必须明确地知道这种变通和让步之后我们何时能再反攻回去，一切必须是出于战略上的必要性，也必须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有战略上的好处。

共产主义的第一大步，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的解放，能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作为基准和总体原则的公有制、渗透在具体过程中的人民具体状况的改善。列宁在第一方面的退却，是为了让第二方面得到推进。如果认为这仅仅是说，推动俄国的生产力发展，从而设想在未来生产力发达的时候自动就会结出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果子，那就太幼稚了；在落后的生产力上的一切发展，首先是因为现实的第二方面的推进能缩短它与目的的第一方面的距离。这里总的目标是解放人民，让能解放人民的原则性的生产关系能够建立起来；而如果人民感觉不到自己日常生活中想要的解放与那社会主义总体的解放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么现实的解放就不可能。

“……他们现在空前破产、空前贫穷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同人们为了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工作之间是有联系的。要做到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了解，他的境况得到了某种改善……用行动向农民证明，我们是从农民所理解、所熟悉、目前在他们极其贫困的境况下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而不是从在农民看来是遥远的、空想的事情做起；证明我们能够帮助农民，共产党人在眼下小农破产、贫困、挨饿的困难时刻，正在实际帮助他们。要么我们能证明这一点，要么就被农民撵走。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政策的基础。”

——“俄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列宁让原则在现实面前作出了退却动作，但这却是以两点为基础的：1.仍然将原则作为一切现实策略的目的和标准，而不是将原则放下2.如果没有条件建立解放的原则，那么就在现实中促进人民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根本目标，公有制是初步实现它的原则，人民具体的解放过程与福祉则是具体策略的指向。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把这个对马克思和列宁都适用的规定搞清楚了。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此，核心即是它的公有制原则。除了既已提及的目标和策略准则之外，诸如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规定，也都从属于这个原则，如果要给社会主义下一个总体性的定义，那么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公有制，这是没有疑问的。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宣言》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

——《哥达纲领批判》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反杜林论》

GS

以上内容均从学理出发，且仅为马列原典研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就一般概念而言的。